

国际战略形势 与中国国家安全

2011 / 2012

國
際
影
像
全
集

卷之三

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

2011/2012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32-515-9

I. ①国… II. ①国… III. ①国际形势—分析②战略形势—
分析—世界③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D5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425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 行 热 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7 字数：17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变化的世界与中国国家安全	唐永胜(1)
美国战略调整的内外因素	袁 鹏(19)
美国安全战略调整及对中美关系影响	孟祥青(35)
债务危机与欧洲政治安全格局	徐弃郁(59)
朝鲜半岛安全形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鹿 音(77)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评估	邱 静(95)
中亚地缘政治变化与地区安全趋势	许 涛(121)
中东战略形势评估	王宝付(139)
南海局势及其发展趋势	[新加坡] 李明江(157)
南海局势及其发展趋向	赵 毅(188)
国际网络空间战略态势评估	温柏华(204)
国际反恐怖斗争形势分析	庞宏亮(226)
后 ECFA 时期海峡两岸政治谈判路线图探析	朱卫东(244)
后记	(263)

变化的世界与中国国家安全

唐永胜*

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调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 的出现、欧洲债务危机、北非中东政局动荡等，诸多重大事变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① 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2011 年的世界呈现出更加纷乱的局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并对国家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

* 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① 考察国际体系变迁需要较长历史尺度衡量，当前这次变迁应该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在沃勒斯坦看来，更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世界体系已经进入大变迁，并以此预见美国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New Press, 2003.

一、变化的世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前的世界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国际力量格局经历着明显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已经充实进许多新内容。^① 世界的整体性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日趋明显；资本、商品及思想在全球渗透，其迅捷程度超出一般想象；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不断出现，一些新因素和原本经常被忽视的因素和角色在国际局势的演进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凡此种种，在变化着的世界中，维护国家安全面临新任务并需要做出新的战略选择。

面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要想在 21 世纪里有大的作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应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换言之，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

^① 近来关于国际体系演变和转型的分析逐渐深入，如林利民：“21 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6 期；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1 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 年版；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3 期；Henry A. Kissinger, “The Three Revolu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7, 2008.

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① 与此同时，世界的不确定性也空前突出，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尤其是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及其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的广泛影响，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其影响具有空前的基础性和渗透性，要认识其内在逻辑需要视通万里，观察其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而避免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

从目前情况及发展趋势看，对中国安全战略选择已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政治特征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随着国际联系的不断增强，国际体系对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影响逐步强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都应适应世界整体性带来的约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以求获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体性增强，必然削弱大国的特殊性。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② 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方向去发展演变，即使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或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在约瑟夫·奈

^① 金铺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0页。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political Imperatives*, BasicBooks, 1997, pp. 209 - 210.

看来，信息革命构成更加微妙的挑战，它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控制的性质，也正在改变软实力的作用，“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会容易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优势加以解决。”^① 约瑟夫·奈进而认为：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长久一些。^② 对于目前的美国如此，对于未来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要争取的不应该是领导者或者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和谐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随着经济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③ 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④ 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以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的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

① [美] 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181—182页。

③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④ 时殷弘在对中国外交哲学的进一步分析中，仍主张中国应成为一个“搭车者”，但同时指出这种搭车主要是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主要表现为在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多方面进步。

第二，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对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和战略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如“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一超多强”、“又一个美国世纪”、“全球化时代”、“后美国世界”^①、“G2 共治”、“无极时代”^②等，诸多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大多具有各自独到的解释能力，其中不乏非常深刻和精彩之处。然而，一旦尝试将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梳理，又难免有杂乱无章的感觉。而实际上，也许正是这种杂乱无章本身所体现的某种复杂逻辑就是对国际局势一种不可忽视的认识途径。多维的世界需要从多维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持续增长近 30 年的美欧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美欧等西方国家为应对危机做出超常的努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到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已严重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进程；而美国经济不振，债务负担增加，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增强，国内政治分歧加剧，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变革。美欧当前的经济社会困难，可以与越战结束前后的情况相比拟，不仅短期难以恢复，目前甚至已经陷入又一波衰退。事实说

^① 关于“后美国世界”的论述可参阅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orton & Company, 2008; Lionel Barber, “The end of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6, 2011.

^② 关于“无极时代”的论述可参阅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刘建飞教授也有关于无极化的相关论述。

明，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亦即美欧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陷入困境，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已不能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必须的空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由此而来，国际局势的未来发展将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具备认识复杂、适应复杂和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复杂性对实现国家利益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从一个对手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连威胁都难以明确界定的世界过渡；另一方面，复杂性增强也为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动荡，所谓“小输入大输出”，对国家不应进行简单的定位，维护国家安全的思考应积极寻求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力量、化解多重威胁、达成多重战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和积累。“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国家战略筹划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适当的弹性，为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在实力迅速增长的条件下探讨中国的国家安全，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

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①吉尔平曾指出，“从根本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世界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权力政治的逻辑，直到今天这种逻辑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近来一些外来势力造成的南海紧张局势，仅是这种困境的一个具体反应。

然而，世界毕竟在不断变化，国际体系不是简单循环，而是进化的系统。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国际体系的演化进程发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显也促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历史证明，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

寻求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过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

^① 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28.

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特征将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多而增强。未来国际关系进化的空间也许更大，国家也将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

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逐步扩展，其中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有西方战略家在较早时候甚至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 21 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① “9·11”恐怖袭击 10 年后，中国 GDP 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达到美国 GDP 总量的 40%。^② 对此，有人过于夸大了中国的实力，以为中国将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按目前趋势，下一个 10 年最流行的字眼将是

^① Jim R. Holmes & James J. Przystup, eds., *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S. Relation with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7, foreword.

^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3, 2011.

‘一切归中国所有’。”^①

然而，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证明，一个原本落后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一旦其实力处于迅速上升或迅速衰败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曾遇到过紧张、冲突甚至战争。如何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调整关系过程中能够产生有益的合作而不是过多的对抗，需要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共同的努力和协调，以破解历史上大国崛起几乎无一例外所遇到过的困境。

由此而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示出的重要性。尤其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② 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抱负。如果再考虑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及引起的各种连带效应，中国的发展潜力将更多地显现出来。与此相关

^① Lionel Barber, “The End of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6, 2011.

^② 国际地位分析是确立战略的基础。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的分析可参考：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唐永胜：“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Books, 1997, pp. 151 – 193.

联，中国也将更积极地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① 在世界范围尤其是亚太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值得注重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维持直线快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轻易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在国际体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中，中国远非处于主动地位。由此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保持了比较积极但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那就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阵，不引火烧身，不将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独立积极作用。”^②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国际作用的提升，国内外一些分析对中国的未来展望过于直线和乐观，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的大半个身子还处于发展中、处于落后的严峻事实，更没有看到由于世界渗透性的增强，即使是一些非国家角色、一些非极力量也都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战略上冒进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今天仍有一些战略研究也习惯性地把愿望当成现实，而不习惯

^① 有关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分析可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23 页。

对问题进行结构性、系统性的科学分析。而在实际上，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应该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矛盾聚集的焦点，以此为条件才有可能成功破解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逐步担当起大国责任。^①

关于“崛起困境”，它与“安全困境”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相互防范和相互对抗的关系，而“崛起困境”在此基础上崛起国家在扩展体系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较大的安全压力。^②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③ 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也在这里。

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向现有国际体系及其秩序提出挑战。实际情况是，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当然，随着对外关系的深入，许多人进一步体会到国际秩序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时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禀赋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很深

^① 近来有多有研究认为中国已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实际不应将其视为中国战略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多重身份国际定位的特点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一旦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就必然受到限制。

^② 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③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黄贤全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的疑虑，甚至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中美关系的起伏和“台独”等极端势力的猖獗，都与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紧密相关，并将在较长时期继续困扰中国。这里要强调的是，仅仅注重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政策约束还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崛起困境”的直观表象。当前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扩张与集聚的逻辑所带来的影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深刻，它对后发国家具有无形的但却是持久的惯性制约。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惯性在加强，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更具基础性。

对于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些人的看法十分悲观。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强调，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旧时代的逻辑，国际政治依然是大国政治，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必然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正是根据这种悲观、循环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看到未来中美冲突的必然性，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不可避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①

客观上讲，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理论还是非常完整和

^①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401 – 402.